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蘇共解散風波

doi:10.30390/ISC.199312\_32(12).0004

問題與研究, 32(12), 1993

Wenti Yu Yanjiu, 32(12), 1993

作者/Author : 尹慶耀

頁數/Page : 35-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312_32(1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蘇共解散風波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三〇

有著百年歷史、支配蘇聯達七十四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的解散，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

有人把戈巴契夫的「改革」和「加速戰略」，看作和黑魯曉夫用二〇至二五年的時間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諾言一樣，同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戈氏的「民主化」和「公開性」雖有其功績，但最後政治、經濟改革的失敗，使共黨威信盡失。

一九九一年七月蘇共中央全會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內，有四二〇萬人退黨，黨員總數又回到一九七五年的一、五〇〇萬人。這該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儘管蘇共威望低落，但其解散還是相當突兀，經過了若干風波。這對研究國際共運，或許不無參考價值。

羅伊·麥德維杰夫說，蘇共的失敗，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應負全責。本文就先從他們談起。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當選蘇共總書記，曾引起一些謎樣的傳說。日本新潟縣縣立新潟女子短期大學教授、時事總研客座研究員中澤孝之，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出版的日文世界週報上為文指出，戈巴契夫是貨真價實由蘇共中央全會一致選出的總書記。中澤根據曾經參加推薦戈巴契夫的政治局會議的李加契夫 (Ye. K. Ligachev) 的回憶錄指出，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政治局會議後，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A. A. Gromyko) 和李加契夫通了電話，決定在翌 (十一) 日政治局會議中推薦戈巴契夫出任總書記。那一天，葛羅米柯和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 (N. A. Tikhonov) 相繼發言推薦戈巴契夫。事實上，全部政治局委員及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書記都支持戈巴契夫。

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死亡當時，有資格繼任總書記的還有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格里辛（V. V. Grishin）和中央書記羅曼諾夫（G. V. Romanov）。不過，契爾年科臨終前並未留下有利於格里辛的遺言。

中澤文後，附有抄譯的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的議事錄。內中有多人的發言。葛羅米柯說戈巴契夫，第一，有難以抑制的活力；第二，經常以黨和社會的利益為念；第三，有非常豐富的黨務經驗。這是他推薦戈氏出任總書記的理由。吉洪諾夫則指稱戈巴契夫是中央書記中最懂得經濟的人。雷日科夫（N. I. Ryzhkov）當日也說戈氏對一般經濟問題知之頗詳。

擔任國際共黨事務的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稱贊戈氏對馬列主義造詣頗深，對最難的綱領問題也能理解。當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格魯吉亞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的謝瓦納澤（E. A. Shervardnadze）稱蘇聯為巨大的多民族國家，而戈巴契夫知道如何深切注意著處理敏感的民族問題。李加契夫稱讚戈巴契夫具有偉大的政治家資質，而且有豐富的知識和充沛的體力。他對工作非常熱中，不斷探索，富有組織能力。

格里辛、羅曼諾夫、亞里耶夫（G. A. Aliyev）、索羅敏澤夫（M. S. Solomentsev）等也紛紛發言，有人稱頌戈巴契夫常常提出具有改革精神的新提案。<sup>①</sup>

戈巴契夫上台後，大力刷新黨政人事，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老人漸次去職。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二日舉行蘇共中央全會，提升政治局候補委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席契布里科夫（V. M. Chebrikov）、中央書記李加契夫和雷日科夫為政治局委員，尼康諾夫（V. P. Nikonov）為書記。同年七月一日的中全會中，資深政治局委員羅曼諾夫辭職，由謝瓦納澤遞補其缺，同時提升柴科夫（L. N. Zaikov）和葉爾欽為中央書記。七月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戈巴契夫推薦葛羅米柯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元首），由謝瓦納澤接任其外長職務。九月廿七日罷黜吉洪諾夫，由雷日科夫接任部長會議主席。十二月廿四日，自一九七一年即擔任政治局委員兼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的格里辛去職，由葉爾欽繼任。這些都發生在一九八五年，此後的人事調整，戈巴契夫所信任的人物紛紛登台，絕大部分應該是改革派。

## 二

蘇共中央書記、列寧格勒省黨委第一書記吉達斯波夫（B. V. Gidashev）於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後，曾批評戈

註① 中澤孝之，「戈巴契夫真正是全會一致選出的總書記—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議事錄證明」（題目略加修改），世界週報（東京），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號，第五一~五七頁。

巴契夫用人不當。他舉亞納耶夫（G. I. Yanayev）為例，戈巴契夫推薦他任副總統，人代會進行過幾次表決都未通過，最後戈氏施加壓力，代表們只得讓步，亞納耶夫才當選副總統。吉達斯波夫又談到選舉蘇共中央書記時，戈氏曾就列寧格勒的卡拉什尼科夫（V. V. Kalashnikov）徵求他的意見。他說：「這是一位知識淵博的教授，一個正派而誠實的人，不過……」，戈氏即打斷他的話說：「好了，好了……」，接著便在會上提議讓卡拉什尼科夫當書記。吉達斯波夫認為，如此簡單化地挑選幹部的方法，遲早要出問題。<sup>②</sup>這話不無道理。

**葉爾辛傳奇**（下簡稱傳奇，書中人名均改依本刊慣譯）<sup>③</sup>一書透露，葉爾欽是烏拉山工技學院建築系畢業，在建築工業界幹了十四年，直到一九六九年斯維爾德羅夫斯克（Sverdlovsk）省黨委會邀請他去主持建設部門（他在那裡任建設部長兼書記，後來做到第一書記）。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日，葉爾欽接到蘇共中央書記道爾吉赫（Vladimir I. Dolgikh）的電話，代表戈巴契夫提出一個中委會建設部長的職位，葉爾欽拒絕了。隔了一天李加契夫又打電話邀葉爾欽去莫斯科，而且提醒他這是黨的決定，不容爭辯。一週後葉氏開始他的新工作，兩個月後升為中央書記，六個月後成為莫斯科市第一書記。正像傳奇所說，從一九八五至八七年，他在莫斯科「橫衝直撞」。因為他接任莫斯科市第一書記後，大肆攻擊特權。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央全會中，他對「重建」（PERESTROIKA）進行的緩慢表示不滿，更指名攻擊李加契夫的保守性。對此，戈巴契夫引用列寧的話說：「最好的人也會犯錯誤」，更斷言葉爾欽「政治上不成熟」。<sup>④</sup>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葉爾欽被解除莫斯科市黨委第一書記職務。傳奇說戈巴契夫曾引用路易十四的一句狠話說：「我不會再讓你涉足政治」。

一九八九年三月廿六日蘇聯舉行第一屆人民代表選舉，戈巴契夫支持提赫米洛夫（Vladimir Tikhomirov）在莫斯科市競選，但葉爾欽卻獲得該市百分之八九·六的選票。傳奇裡這樣記載著：

「不幸的，米海爾·謝爾蓋耶維奇（Mikhail Sergeyevich 戈巴契夫之名）明顯地右傾了」，葉爾欽幾個月後曾說：「現在不是李加契夫偏向右翼，而是總書記本人。我覺得他把我們社會帶向一個政治迷宮裡——但不曉得他知道出路否。」（第二六頁）

此後，葉爾欽的攻擊矛頭，就直接指向戈巴契夫。

註②

石橋譯述，「吉達斯波夫談蘇共前途等問題」，今日蘇聯東歐（上海），一九九一年第五期，第一三—二四頁。原報導載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真理報。

註③

索羅夫約夫、克雷必柯娃合著，葉爾辛傳奇，張敏華等譯（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初版。

註④

下斗米伸夫，戈巴契夫時代，日本：岩波書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廿五日第一版第二刷，第六三頁。

戈巴契夫的改革導致黨內的分裂，甚至他的改革派也分成了激進與保守兩派，而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至十三日的蘇共第廿八次代表大會，就成為「百家爭鳴」的大會。

大會之前，同年六月俄羅斯共和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保守派的波洛茲科夫（Ivan Polozkov）當選第一書記。激進的葉爾欽也於同月當選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而蘇聯遠東的馬加丹（Magadan）地區選舉的代表，於大會一開始就要求發言，其發言內容是要求領導階層立即總辭。面臨著此一局勢，戈巴契夫就在大會中採取攻勢防禦。

在題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與黨的課題」的報告中，戈氏以警告的口吻說：「反改革的勢力如果獲勝，黑暗的時代即將來臨。」他對經濟、社會、民族、文化、意識形態各領域的「失誤」，指稱「政治局應該負責」。他雖對激進派指摘「我們在引進資產階級的體質，將我國改變成資本主義路線」的說法有所批評，但重點是在攻擊保守派。他大力抨擊：

「執拗地摟抱過去，阻止議會刷新，在改革途中擋住去路，自稱堅守純潔的意識形態原則，卻固執著保守立場的人們」<sup>⑤</sup>。

李加契夫已經成為保守派的代表，他於大會第二天演說稱：「由於考慮欠週的激進主義和臨場湊合政策的結果，過去五年只有一點點成果。」又說：「由於輕視階級的觀點，社會上發生了否定的現象」。「私有制會造成國民的分裂」。

在保守勢力的支持下，李加契夫公然向黨的新綱領及新設副總書記案挑戰。戈巴契夫提名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伊瓦什科（Vladimir Ivashko）為副總書記候選人，這場副總書記選舉，實際上是戈巴契夫單打獨鬥。伊瓦什科接受提名後的演說時間僅僅五分鐘，可能是因為講多了就會紕漏百出。為了防止李加契夫當選，戈氏竟然把「如果對候選人有正當的理由，候選人就不能再作候選人」的塵封已久的中委會老規則端了出來，誘發激進派對李加契夫的反對之聲。李加契夫在選舉中屈辱地失敗了。大會最後一天選舉中委時，也被排出候選名單之外，他只好孤零零地跑回西伯利亞的故鄉寫作回憶錄。

葉爾欽在七月六日的演說中說：

「要看看東歐各國共產黨的命運，從國民遊離，不是就會被國民拋棄嗎？如果蘇聯共產黨改革失敗，就會把國民推向敵對的一邊。」

又說，黨已面臨著「改革？還是歷史的敗北？」的抉擇關頭。大會閉會的十三日，他接受莫斯科電台的訪問時說：「這次大會是黨在各個領域煥然一新的最後機會，但是刷新失敗。雖然有一些前進，但是有關黨所必要的事物，幾乎看不到絲毫進步。」

註⑤ 傳喜之，「與『僵死』的共產黨保持距離的戈巴契夫」，世界週刊（日本），一九九〇年八月七日號，第二一頁。

葉爾欽於絕望之餘，在大會上宣布：

作為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比什麼都重要的就是在國民之前負起責任，不能唯黨的命令是從！他選在大會最後一天宣布脫黨，高級黨校校長蕭斯塔克夫斯基、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民主講壇」（Democratic Platform）代表李森科（Vladimir Lysenko）、改革派經濟學家、莫斯科市長波波夫（Gavril Popov）也相繼脫黨。

廿八大要實行黨政分開，將行政權力轉移至政府，黨的權力降低，戈巴契夫的聲望也隨之降低。大會前「全國輿論研究中心」舉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對蘇聯領導完全不予以信賴者由五月間調查的百分之一六，上升到百分之四六；完全信賴者百分之六，比五月間的調查又降了八個百分點。<sup>⑥</sup>

戈巴契夫想在左、右派的勢力均衡中維持自己的統治，其結果則是身受左、右夾擊。

### 三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俄羅斯共和國舉行總統大選，當選的是葉爾欽，激進改革勢在必行，對蘇聯的影響極鉅，保守派不得不有所動作。十七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由魯吉揚諾夫（A. Lukyanov）主持，部長會議主席帕甫洛夫（Valentin S. Pavlov）要求賦予政府臨時大權。重要的閣員如國安會（KGB）主席克留契科夫（V. A. Kruchkov）、國防部長雅佐夫（O. T. Yazov）等等發言，都別有用心地強調帝國主義的陰謀。據波波夫判斷，帕甫洛夫等那項擴權陰謀是朝向俄羅斯來的，目的在將葉爾欽、俄羅斯議會和在地方選舉獲勝的民主派人士全部排除。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少數民族代表的質問中，暴露了帕甫洛夫等的企圖，是以臨時大權對付俄羅斯及其他各共和國。休息後，戈巴契夫突然現身議場，演說中也認為此時不宜通過帕甫洛夫的提案，其事遂遭擋置。<sup>⑦</sup>

波波夫自承他曾要求美國駐蘇聯大使急電布希總統轉告葉爾欽急速返國，因為蘇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布希卻直接電告戈巴契夫，戈氏還曾質問波波夫為何求助於布希？波波夫並未說戈巴契夫自導自演，但認為他知悉了政變的情報而不予理會，就像當年史達林獲知納粹即將進攻蘇聯而置之不理，一樣的不可原諒。<sup>⑧</sup>

註⑤ 以上資料參閱註④。

註⑥ 波波夫，「葉爾欽對戈巴契夫的權力鬥爭」（札記，題目稍加改易），袴田茂樹解說，中央公論（日本），一九九三年七月號，第一四一～一四七頁。

註⑦ 同註⑥。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震驚世界的蘇聯政變爆發，領導者代總統亞納耶夫說，他們是要推翻葉爾欽，至於戈巴契夫很快會回到總統的職位（傳奇）。政變三天後即告失敗。抵抗政變的英雄是葉爾欽，從休假地被釋回的戈巴契夫則黯然無光。政變中的人執政團都是他一手提拔或安排的。領導者是他力保的副總統亞納耶夫，主謀者是他的好友、搭檔魯吉揚諾夫，他的黨務助理克魯欽那（Nikolai Kruchina）也是政變的策劃者之一，至於由他安排坐在副總書記寶座的伊瓦什科所領導的黨中央，在政變中沒有絲毫反抗的表示，這會使得他有些氣餒。

波波夫敘述的政變後對共黨的處置經過，是值得參考的。首先是戈巴契夫辭去總書記一職，最初他並沒有這個意思，是波波夫和魯希柯夫（依日文譯音，疑似雷日科夫，但未能確定）力勸，魯並口述辭職聲明文稿，他才決定辭職。也許是受了近旁人們的影響，聲明被改得很差勁，而且延遲到葉爾欽發布禁令後公布。<sup>⑨</sup>

依照中共「新華社」莫斯科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四日電，塔斯社報導的戈巴契夫聲明說，由於蘇共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沒有反對」最近發生的事件，中央委員會「未能站在譴責和抵制的堅決立場上」，蘇共中央應當作出「自行解散的決定」，「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的命運由它們自己決定」。聲明中還說，「對我本人來說，我認為已沒有可能繼續履行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能，我正交出相應的權力」。另據塔斯社報導，戈巴契夫在廿四日發布命令說，蘇共財產由各人民代表蘇維埃「加以保護」，這些財產今後如何利用的問題，「應嚴格根據蘇聯和各共和國有關所有制和社會團體的法律加以解決」。戈巴契夫總統當天還發布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蘇聯軍隊、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各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在上述機構中的各政黨和政治運動的成員可以在這些機構之外和業餘時間參加政治活動。<sup>⑩</sup>

在莫斯科，八月廿三日的市議會中，波波夫提議將蘇聯共產黨地區委員會的建築置於莫斯科市管轄之下，以免黨機關湮滅有關政變的資料。這項提案獲得議員們的支持。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市委員會第一書記普羅科費耶夫（Yu. A. Prokofyev）被剝奪了議員資格。波波夫說，如果最高蘇維埃有指令，恐怕會再從議會中趕走二〇至三〇人。

對於蘇聯共產黨全體，據波波夫記述，當時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沒有什麼動作，戈巴契夫個人也不準備辭去總書記，他們就把希望寄託在葉爾欽身上。當時的情報說，蘇共中央、地方委員會、蘇聯國安會、地方 KGB，到處在焚燒文件、搬運東西，然而莫斯科市長不能下令進入此等建築，如何完成接收此等建築物的任務，波波夫記述頗詳。<sup>⑪</sup>茲不贅述。

在八月廿四日「新華社」莫斯科的塔斯社報導中稱：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分別發表命令，將蘇共中央總務部和蘇共地方黨

註⑨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六日，第六版。

註⑩ 波波夫有關記述，俱參註⑦。

委的檔案以及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檔案轉交俄羅斯檔案機關。<sup>⑪</sup>

榮植在中共世界知識雜誌一九九二年第廿一期上發表「蘇共案件和戈氏基金會風波」一文，報導葉爾欽乘「八·一九」政變後自己聲威大振之機，針對蘇共下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八月廿三日下達的，宣布停止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當時在他身邊的戈巴契夫勸阻未成。兩天後葉氏下第二道命令，沒收蘇共和俄共的全部不動產和動產，要求各國政府凍結蘇共在國外的資金，向俄羅斯政府提供這些資金的數額和銀行賬目。同時葉爾欽宣稱戈巴契夫要對「八·一九」事件承擔責任，因為事件的發動者都是戈氏提拔起來的。兩個多月後的十一月六日，葉氏簽發第三道命令，禁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

前引各項資料，是可以互相參看的。

## 四

蘇共被停止活動，也引起一些反對的聲音。俞汲深從蘇聯報刊上摘譯的言論中，有的指摘從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至七月一日）到蘇共第廿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九〇年七月二日至十三日），用了兩年時間搞「政治改革」，重點是所謂「黨的自身改革」，其實質是拆除共產黨。有的認為蘇聯推行多黨制的結果，不僅在共產黨之外出現了幾百個大大小小的政黨，而且蘇共內部形成好幾個黨派。蘇共的戰鬥力大大削弱，組織分裂亦不可避免。「俄羅斯共產黨人民主黨」、「俄羅斯共產黨倡議派」、「蘇共布爾什維克綱領派」、「馬克思主義綱領派」、「共產黨人民主運動」，以及一個名義上叫運動、實際上是變相政黨的「民主改革運動」都已公開化。這些組織按原計劃要在九、十月間召開成立大會。它們建黨之日，亦即蘇共分裂之時。其中「俄羅斯共產黨人民主黨」和將由民主改革運動變成的「聯合民主黨」，儘管相互間仍有分歧，但很可能會併成一個大黨，成為蘇共反對勢力的政治基礎。有的人說，蘇共中央（一九九一年）七月全會原已通過了新黨綱草案，準備提交非例行的廿九大審議。這個黨綱草案和戈巴契夫在全會上的報告，明白無誤地要把蘇共變成一個真正社會民主黨式的議會黨。蘇聯局勢的反復劇變，打亂了事情的進程。<sup>⑫</sup>

前引種種是在追究蘇共分裂的責任。對於蘇共解散一事，蘇聯各方面的報導，蘇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以及俄共領導機關，事先並不知道緊急狀態委員會（政變組織）的行動，但仍成為「反社會主義」勢力的主要摧毀目標：蘇共中央委員會被宣布解散，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委辦公樓被查封，蘇共財產被俄羅斯聯邦沒收，俄聯邦的蘇共各級組織由同級政府接管，在各

註⑪ 人民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廿六日，第六版。

註⑫ 俞汲深，「蘇聯共產黨人在危難中鬥爭」，蘇聯東歐問題譯叢，北京，一九九一年第五期，第一九二二三頁。

級國家機關和軍隊任職的共產黨人紛紛被清洗；等等。蘇聯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九一年九月二日至五日）上，蘇聯人民代表、蘇共中央委員、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Roy Medvedev）受蘇共議員團委託，嚴正指出，把蘇聯共產黨從政治舞台上驅逐出去並停止其活動是「非法的和專橫的」；蘇共中央「過去沒有作出，今後也不會作出自行解散的決定」。<sup>⑯</sup>

真理報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報導了莫斯科法學院教授B.馬爾捷米亞諾夫答記者A.彼特魯紹夫問：「當政治鬥爭的邏輯高於法律時」說：命令蘇共「暫停活動」這一措施，除了政治鬥爭邏輯之外，沒有任何依據，也不符合任何一項法律。它違反蘇聯憲法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憲法。現在，「人權和自由宣言」公布了。從這個文件的觀點看，上述命令也是站不住腳的。以宣言第九條言：「公民有權聯合結成政黨、工會和其他社會團體，參加群眾性的運動。」難道這項法令今天對我們毫無意義嗎？彼特魯紹夫提到真理報編輯部收到大量電報和文件，提出：「把共產黨的財產收歸國有是否合法」？「法院搬進了黨區委會的大樓。既然他們幹了這種不公正的事，他們怎能作出公正的判決呢？」馬爾捷米亞諾夫的回答是：瓜分蘇共的財產是對法律的踐踏，因為「蘇聯所有制法」沒有關於對某人的財產實行國有化的規定。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關於社會聯合體」的蘇聯法律規定，根據法院決定被取締的社會聯合體的財產可無償地轉為國家財產，但蘇共目前並沒有被取締，只是暫停活動。而只有法庭可以取締黨和任何社會聯合體。只有蘇聯最高法院才能取締蘇共。而且法院要遵守相應的法律程序。那裡有法院的決定？那裡有法律程序？<sup>⑰</sup>

吉達斯波夫也指摘：「……查封省委辦公樓，主人不在私闖辦公室。到那裡取了什麼，在那裡放了什麼誰也不知道。這破壞最起碼的法律權力。人權、赫爾辛基協議就更不談了……。」<sup>⑱</sup>

從法律觀點言，蘇共「暫停活動」的措施確有瑕疵。當蘇聯和蘇聯總統還存在時，葉爾欽對有關蘇共問題直接下達命令，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六日，他又簽署停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領土上活動的命令，都是會有爭議的。

## 五

吉達斯波夫認為，戈巴契夫不經中央全會討論而宣布不當總書記是個極大的錯誤，採取的是對千百萬普通黨員不公正的步驟。

註(1) 同註(12)。  
註(14) 秦鮑摘譯，「暫停共產黨活動的法令是違反憲法」，蘇聯東歐問題譯叢，一九九一年第六期，第一二三～一四頁。  
註(15) 同註(2)。

戈巴契夫下台後不甘寂寞，屢屢出國訪問，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正像美國新聞週刊所說：他「在國外受歡迎的程度仍然大於國內的。」

在國內，戈巴契夫可有些麻煩。榮植的文章中報導說，一九九二年初，三十七名俄羅斯人民代表聯名向俄羅斯憲法法院控告葉爾欽有關蘇共的三道命令超越憲法授予他的職權範圍。五月初，俄羅斯憲法委員會責任秘書奧·魯緬采夫等十餘人提出反訴訟，反控蘇共一貫違反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規定，把自己置於憲法之上，因而要求審查蘇共的違法行為。俄羅斯憲法法院決定把兩案並作一案審理。在數次開庭審理中，法院傳喚了數十名證人，其中包括一些前蘇共領導人。

由於戈巴契夫不斷抨擊葉爾欽，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葉爾欽的新聞秘書即向戈氏發出警告，不久就收回了政府配給戈氏的吉爾牌轎車。九月十五日，俄羅斯憲法法院在休庭了一個半月後重新審理「俄羅斯總統令與蘇共案件」，戈巴契夫和原蘇共一批領導人被列入證人之列。戈氏指此為「一場政治鬧劇」。九月廿一日，該法院宣布決傳喚包括戈氏在內的一些前蘇共領導人到庭作證，以弄清蘇共「非法」向外國共產黨提供大量外匯，以及蘇共是否違憲等問題。戈氏拒絕出庭，且於九月廿九日在共青團真理報發表致法院的公開信中，指責法院，「捲入了與其職能不相稱的活動，變成了政治對抗的人質」。戈氏的態度激怒了憲法法院院長佐里金，他指稱戈氏的行為是對俄羅斯公眾的挑戰、對法律的蔑視和對法院的侮辱。葉爾欽也抨擊戈氏「不尊重法制國家」。十月一日法院再警告戈氏，如再拒不出庭，法院將採用「一切憲法和法律手段」迫其就範。第二天俄外交部沒收了戈氏的出國護照，俄安全部也表示已採取措施「以防止戈氏在履行公民義務前離開俄國領土」。

同年十月五日，憲法法院繼續開庭，前蘇共第二號人物李加契夫等人出庭作證，戈氏仍加拒絕。法院科以一〇〇盧布罰鍰，再度傳令他於十月七日到庭作證。葉爾欽則簽署法令，於七日將他先前專案批准的戈巴契夫基金會總部三、五〇〇平方公尺的辦公大樓全部轉撥給財經學院，只准基金會租賃其中的一、〇〇〇平方公尺的辦公室。同時將戈氏名下的鄉村別墅割給了政府的金融研究所。十月十三日俄外交部新聞處宣布將護照發還戈巴契夫，以便戈氏能前往柏林參加前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的葬禮。據說，這是法院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sup>⑯</sup>

依「新華社」報導，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蘇共召開中央全會，決定解散蘇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因為它們「沒有能夠確保黨的領導」。同時，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因瓦解黨和國家、背叛勞動人民的利益」，被宣布開除黨籍。<sup>⑰</sup>其實，這已無關痛癢了。

註<sup>⑯</sup> 有關戈氏下台後資料，請參閱：（一）榮植，「蘇共案件和戈氏基金會風波」，世界知識，一九九二年第廿一期，第五六頁；（二）孫潤玉，「下台後的戈爾巴喬夫」，世界知識，一九九二年第廿一期，第二二三頁；（三）張鐵，「八·一九之後的戈爾巴喬夫」，半月談（中共），一九九二年第廿一期，第五八六一頁。

註<sup>⑰</sup>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第六版。

在中共的有關報導中，有意無意地在替蘇聯共產黨人的未來打氣。其實，早在蘇共被禁止活動之前，蘇共就氣勢已衰。根據兩位都是蘇共廿八屆中委和「俄羅斯勞動人民社會黨」主席之一的羅伊·麥德維杰夫和馬爾采夫（A. Maltsev）的說法，一九八九年蘇聯人民代表選舉中，當選者百分之八七是共產黨人。但兩年半內有一半多人民代表退出了共黨，加入其他政黨和派別來反對蘇共。一九九〇年春，人代會中蘇共議員團有七三〇人，還有不少於七〇〇至八〇〇名蘇共人民代表（如「生態學家」議員團、「聯盟」議員團、青年議員小組、工會議員小組中的蘇共黨員）支持蘇共的立場和政策。到一九九一年春，出席共產黨議員團會議的只有一五〇至二〇〇人。「八·一九」政變後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時，出席共產黨議員團會議的只有四〇至五〇人。蘇聯最高蘇維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在全蘇境內禁止蘇共活動的決定。起草該決定的委員會就是一九八九年由蘇共推出的人民代表索利卡姆紙漿廠的經理B·爾丘克領導的。而在最高蘇維埃會議和人民代表會議中反對這個決定的卻是一位一九六九年因批判史達林主義而被開除出蘇共的一名人民代表。他曾作為獨立的競選人在選舉中擊敗了五名蘇共候選人。

梅、馬二人指出，一九九一年反對蘇共的任何一個命令都沒有引起任何保衛蘇共的運動。沒有任何集會、遊行、罷工來捍衛被禁止的共產黨。工人、集體農莊、職工都不捍護蘇共，大多數知識分子早就離開了它。黨及其過去的領導人喪失了威信，而尚有威信的只是那些在不同年代退黨的領導人，如葉爾欽（一九九〇年退黨）、雅科夫列夫（A. N. Yakovlev）、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魯茨科伊（Alexander Rutskoi）（一九九一年退黨）和波波夫（Gavril Popov）、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一九八九年退黨）。正是為此，一九九一年八月和稍後的秋天，黨沒有經受太大的打擊和衝擊便開始瓦解。梅、馬二人說，這種情況和統治俄國三〇〇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垮台的情形十分相似。<sup>⑩</sup> 蘇共被禁止活動及戈巴契夫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後，蘇共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在副總書記伊瓦什科主持下召開了書記會議，決定同現實妥協，解散中央機構和黨的其他機關。並決定成立一個撤銷委員會，處理黨的解散和移交黨的財產問題。梅、馬二人的文章透露，在同年八月末至九月間，一連幾週，出現群眾性退黨的浪潮。在莫斯科，還有人把黨證賣給外國人，開始每個一〇〇美元，後來一〇美元。在有二〇〇至三〇〇名黨員的企業和機關中，最後只剩下幾個人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

在上述種種情況下，蘇共還能復興嗎？然而，梅、馬二人是希望甚至認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能夠復興的。他們說：「取消蘇共及其領導機關，絕不意味著共產黨及社會主義的同情者從政治舞台上消失。」蘇共究竟能否復興或復生呢？這已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納的了。

註10

麥德維杰夫、馬爾采夫，「蘇共禁止後的俄羅斯共運」，蕭桂森摘譯，東歐中亞問題譯叢，北京，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二—八頁。